

茅盾与《汉口民国日报》

□ 邓涛



1926年底，茅盾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仅仅42天时间，就为这份“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报”创作了34篇文章，影响广泛。

主笔《汉口民国日报》

1926年12月上旬，沈雁冰（茅盾）接到武汉来电，党中央拟派他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教。月底，茅盾到达武汉。

1927年4月初，中央决定让茅盾主笔发行量超过万份的《汉口民国日报》。

《汉口民国日报》于1926年11月20日创刊，馆址设在汉口散生路忠信二里4号（现江汉路泰宁街2号），编辑部设在德安里1号；董必武任经理，主编宛希俨，毛泽民负责行政工作。

《汉口民国日报》是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由北伐军总政治部和国民党湖北省和汉口市党部共同筹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迁汉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省、市党部联办，后改为国民党省党部机关报，也是共产党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

这张报纸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宣传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政策，报道北伐战争的胜利，支持工农群众运动，揭露帝国主义与新旧军阀的罪恶行为，在全国及国际上颇有影响。

4月29日署名“雁冰”的社论——《欢送与欢迎》见报，内容涉及欢送北伐将领出征、国际工人代表回欧，欢迎日本工人代表抵鄂。翌日，茅盾又发社论《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节》。

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5月4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同署“雁冰”发了两篇社论。第一篇是《“五四”与李大钊同志》，指出：“我们对于李大钊同志等的被害，无限的悲哀，我们一定要从悲哀中生



《汉口民国日报》报样

出更大的勇气与反革命派决一死战。”第二篇是《革命者的仁慈》，揭露蒋介石秘密绞死江苏党部负责同志等20余人的残暴罪行。

1927年5月5日，茅盾发表社论《五五纪念中我们应有的认识》，指出：当日是马克思的生日，也是6年前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之日，应把“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更清楚地认识我们的使命，切实担负起这个使命来”。

5月7日署名“雁冰”的社论《〈廿一条〉与一切不平等条约》发表。9日署名“珠”的社论《袁世凯与蒋介石》，指出：“蒋介石实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袁世凯，他比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更能学袁世凯……他的覆亡一定比袁世凯更快，他结局一定比袁世凯更坏！……打倒袁世凯后身的蒋介石！”10日又发社论《蒋逆败象暴露了》（署名“珠”），文中指出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一须武装民众，二须严厉镇压武汉反动派，三须根本铲除乡村封建势力”。

11日发表社论《巩固后方》（署名“珠”）。当天，驻汉口的英国水兵开枪打伤码头工人1人，工人闻讯云集，外交部派员到场调查。次日，署名“雁冰”的社论《英帝国主义又挑衅》发表。13日，发表社论《前方胜利中我们的责任》（署名“珠”）。16日发表社论《祝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特别党部成立大会》（署名“雁冰”，以下亦然）。20日，发表社论《巩固工农群众与工商业者的革命同盟》；21日发表政论《工商

业者工农群众的革命同盟与民主政权》，希望工商业者加入革命阵线。

批判反动军阀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当日叛军即被击溃，武汉人心大定。第二天《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夏斗寅失败的结果》，指出：“夏斗寅的失败是对蒋介石的沉重打击。”23日发表社论《我们的出路》，指出：“我们有出路！我们已经到了出路之口，再进一步，就是胜利！”25日副刊第20号发表杂文《“五卅”走近我们了》。26日的社论《整理革命势力》指出：整理革命势力的目的是“建立乡村自治机关，确定乡村的民主政权”，“切切实实为一般农民谋利益”。29日，发表社论《英俄绝交之观察》。

6月4日，署名“雁冰”（下同）的散文《读李品仙军长等东电》见报。6日发表社论《民众应认识有奖债券之性质》，9日发表社论《郑沅洛克复后之革命形势》，11日发表社论《杨森溃败之观察》，12日发表社论《负伤同志的娱乐问题》，13日发表社论《欢迎中央委员会暨军事领袖凯旋与湖南代表团之请愿》，14日发表社论《扑灭本省各属的白色恐怖》，15日发表政论《长沙事件》，18日发表社论《肃清各县的土豪劣绅》，24日发表社论《论上海之反日运动》，揭露蒋介石暗中指使红枪会以反日为幌子，在信阳、柳林等地掘断路轨扰乱北伐军后防的罪恶阴谋。

7月7日，署名“雁冰”的社论《武汉市民怎样解除目前经济的痛苦》发表。第二天茅盾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后，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辞去主编一职。当天就和毛泽民一道转入“地下”，“失踪”在一个栈房里。

隐蔽了半个月光景，茅盾和宋云彬等人奉命赴九江，到达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到上海。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从此他开始了文学活动，先后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连续的中篇小说。

7月18日，董必武辞去《汉口民国日报》经理职务。1927年7月

宁汉合流，共产党人被迫撤出报馆，报纸性质随之改变。该报于同年9月30日终刊。

“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报”

《汉口民国日报》是全国性的报纸，它在上海、北京、广州、南昌、长沙、福州、莫斯科、日内瓦、伦敦、巴黎、纽约都聘有特约通讯员。该报日出版12版，巧妙地把贯彻孙中山制定的新三民主义政纲与宣传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相结合，内容丰富，综合性、战斗性强。它开辟多种专栏，大量刊登工农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如实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武汉政府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茅盾负责审稿，而后写一篇千字社论，斥责蒋介石。编辑部的编辑除一人是国民党左派外，石信嘉、孙际旦、宋云彬、马哲民（马念一）、李达可、倪文海等都是共产党员。

据《茅盾回忆录》记载：就该报的性质，是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报。报纸的办报方针、宣传内容、经营管理由中宣部确定，茅盾任主编期间瞿秋白兼管武汉的宣传工作。“四一二”前夕，政治形势十分复杂，瞿秋白指示茅盾要着重三方面的宣传，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

由茅盾主编的34篇社论和其他文章，大体分为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宣传反帝革命斗争；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就某些具体问题而讨论。坚持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坚持党的战斗风格和策略性，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摘自2024年2月29日《人民政协报》）



1931年11月的一苏大会期间，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成立。为了更好地对国统区开展政治宣传攻势，并同其他苏区的党组织交流新闻材料，繁荣苏区的新闻文化事业，经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红中社”创建了红色中华新闻台。“我们党第一次越出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国人民传播了胜利的佳音。”不久，红色中华新闻台与红色中华报社合署办公。

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为此制定《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工作计划》，成立了第二次全苏大会筹备委员会。对于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提到大会的消息通报有4种方式，其中排首位的是“无线电广播”；对于其他苏区的准备，指出要“经过无线电台与他们发生联系将苏大会准备工作的计划告诉他们，要他们报告他们作准备的工作”。可见，电台广播是二苏大会议消息的主要传播形式，各地通过电台以了解会议筹备相关信息，并及时向瑞金报告参会的准备情况。

当时的新闻台虽然还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广播电台，却能有效地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聲音傳播到各大苏区。时任红中社编辑任质斌说道：“每天以红中社名义发几条新闻出去，用无线电明码向全国广播，内容是报道苏区建设消息、红军捷报或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声明、宣言等。”不仅如此，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电台乃至苏联的电台，

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广播

□ 孙伟

也都能收听到来自瑞金的红色电波。

当时各主要苏区和红军部队的报刊，曾大量刊登了红色中华新闻台播发的新闻，而各苏区电台发来的重要消息，也及时刊登在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上。通过这种互动方式，中央苏区与各地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实现了信息的共享，不仅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广大苏区军民的士气。

（摘自2024年3月7日《光明日报》）

跨越千山万水的代表证

□ 程宇一 宋可昶



李珊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证

江苏省句容市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珍藏着两件革命文物——段焕竞、李珊夫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两张代表证均长8.4厘米、宽6厘米，呈对折的长方形，以暗紫色素布为封面，内页印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字样。这两张简单朴素的代表证背后，是一段历经千难万险的5000余里跋涉。

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困难重重、险象环生。

1943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通知段焕竞、李珊等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段焕竞为新四军第1师第2旅副旅长，妻子李珊在第2旅卫生部当教导员。3月，段焕竞和李珊带着女儿从江苏东台大桥镇出发前往延安。途中，他们凭着智慧和勇敢，冲出日军包围、躲过严厉搜查、挣脱汾河淤泥，跋涉5000余里，历时半年之久，终于抵达宝塔山下。

与此同时，其他代表也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有的依托党的武装力量或地下党组织，游走于荆棘丛间；有的易容化装，一路辗转躲避日军围追堵截；有的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就如百川朝海般，历经山高水长、冲破艰难险阻，共赴相同的目的地，终而汇聚在宝塔山下，展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风貌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众星何灿烂，北斗挂

延安。大海有波涛，飞向清凉山”，陈毅的诗作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这场“小长征”。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段焕竞、李珊手持代表证和750余名代表一起步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大会的民主气氛十分浓厚，代表们对重要报告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深入讨论。考虑到许多代表反映讨论时间不够，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因此主席团决定延长大会日期。就这样，从春末到盛夏，代表们手中的代表证陪伴他们度过整整50天时间。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20余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会后，李珊专门制作了一个皮挎包收藏这两张代表证。无论是在日晒雨淋的千里行军途中，还是在大江南北的解放战场上，20多年里，这两张代表证一直保存在李珊身边。李珊去世后，段焕竞又将这两张代表证与家里的照片一起放进铁盒子保护起来，直到去世。他们的子女整理遗物时，在存放照片的铁盒子里发现这两张代表证。2007年，段焕竞、李珊的子女将代表证捐赠给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收藏展示。

（摘自2024年3月21日《中国国防报》）

彭雪枫：勤俭无私 赤诚报国

□ 赵新潮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这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为悼念彭雪枫而共同题写的挽词，对彭雪枫的革命人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彭雪枫，河南镇平人，原名修道，1907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师长、师政委，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等职。1944年9月11日，在指挥河南夏邑八里庄的战斗时，彭雪枫不幸被流弹击中，英勇殉国，年仅37岁。彭雪枫战功卓著，享有“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盛名，20年代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彭雪枫留下的家书和日记抒发了伟大的爱国情怀，传承着感人的红色家风。

彭雪枫家境贫寒，但家人对他的教育极为重视。彭雪枫的祖父是一位粗通文墨并讲究道德修养的人，彭雪枫四五岁时，祖父就亲自教他读书写字。稍长，他又在伯父彭延庆办的私塾为富家子弟做伴读。在小学读书期间，彭雪枫尤感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废寝忘食地刻苦读书。后来，彭雪枫以“儒将”闻名天下，被称颂为“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这与他自幼勤奋好学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离家之初的艰难时期之所以能够做到自力更生，就是“凭着祖父给我幼小时的一点‘文化’，父母给我的教养下的聪明（他们都是正直无私的人）”。

彭雪枫从小就养成了热爱劳

作、艰苦朴素的品质。为了补贴家用，其父除耕作外，还以织绸为副业。在私塾和小学读书期间，彭雪枫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父亲织绸。后来他去城里上学，为了一双鞋能多穿些时日，以减少母亲做鞋的辛劳，进城时，他一离村便把鞋脱了拿在手中，到城边再穿上；回家时，一出城又把鞋脱了，进村后再穿上。到了35岁结婚时，当大家看到他那床被子已破烂不堪，要给他换床新被子时，彭雪枫怎么也不肯换，同爱人一道拿起针线，把破被子一针一针补起来。事后，他对爱人说：“如果我们结婚换新被子，其他干部怎么办？目前部队很困难，我们不能特殊。”

彭雪枫深爱自己的妻子林颖，在频繁的书信往来中与她交流为人处世的看法，互相鼓励，共同进步。恋爱期间，彭雪枫就在信中说：“待人接物上，不要过于锋芒外露……注意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待人接物，更谦逊些，更诚恳些，更大方些，更刻苦努力些！”同时，还将毛泽东在其外出进行统战工作时临别叮嘱的一句话“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送给她，与之共勉。结婚之后，针对妻子在如何交友和待人接物方面的提问，彭雪枫答复道：“既交友了，又怕人家存戒心，不易接近，那只有靠自己的一‘诚’字，日久天长，自能潜移默化了。……诚实是虚伪的反面，为古今中外所共认的美德，我辈应以此二字共励共勉。”

彭雪枫对孩子满怀深沉的爱。1942年12月3日，在妻子待产之际，彭雪枫写信关心地问：“孩子应该生下来了？这是我最关怀的事！”12月16日，当得知孩子出生后，他又写信说，“既已生下，不管男女，

